

一个社会主义者 的发展过程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供内部参考)

D143

13

一个社会主义者 的发展过程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史集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uard Bernstein
ENTWICKLUNGSGANG
EINES SOZIALISTEN
Felix Meiner Verlag in Leipzig 1930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史 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2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77 定价(七)0.30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臭名远揚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1850—1932）的自傳，从他的幼年时代叙述到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止，而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論活动为主要內容。在书中，伯恩施坦企图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政策辯护，为他自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沙文主义立場以及 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叛变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行为辯护，而实际上却处处暴露了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面目，这本书也就成了这个老牌修正主义者的自供。伯恩施坦还在书中叙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和簡單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理論著作，并在书后附有一份主要著作目录。

伯恩施坦这个自傳最早发表于 1924 年，原是費里克斯·迈納尔編輯的《現代国民經济学說的自述》第一卷（德国萊比錫費里克斯·迈納尔出版社出版）的附录，1930 年由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本书是根据单行本譯出的。

目 录

童年和学生时代.....	1
精神激励和青年时期的政治印象.....	3
加入社会民主党.....	7
銀行职员和鼓动员.....	10
在杜林和馬克思之間.....	13
馬克思主义者.....	16
修正主义者.....	25
世界大战以前.....	39
世界大战期間.....	45
在德意志共和国.....	50
附 录.....	56

童年和学生时代

我童年和少年成长时的环境以及我的青年时期并不特别有利于我向科学家方面发展。我出生于1850年1月6日，是一个子女过多的父母的第七个孩子。从出生时起，甚至直到18岁的时候，我都长得特别矮小，体质很弱。由于体弱，我也特别胆怯，并且除了在幻想的时候外，我还很自卑。当我相当早地学会阅读以后，晚上看书时总是躲在一间只点着一盏微弱油灯的房间的最远的角落里，因此我少年时就尝到了近视的痛苦。这一点再加上我的身体弱，又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发展得很差。

我的双亲持家十分俭朴。父亲原来是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他的收入当时即使只是按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来养活一个一度达到十口的家庭，也是不够的。我的双亲讲究体面，让我们在夏天也同冬天一样都穿上鞋袜并且送我们进较好的学校，因此在其他方面就必须更加节省。这一来，我就很少能像街道上的同辈朋友（他们在夏天都是赤足的）那样得到零用钱。但是，我的青年时期虽然从某些角度来看忧虑重重，却并不算不幸福。

的确，我不得不常常听到人们当面议论我：“唉，他顶多再活一两岁。”我已经17岁的时候，我们同院的一位邻居（那时我偶而到他那里玩）当面对我说：“爱德华，您活不到20岁。”然而我不想说，这些话引起了我很大的苦闷。它对我产生的不良影响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对我的智力发展举足轻重的那几年里夺去了我的任何进取心。一直到成年时我对我的生命从来没有信心，因此我抱着一种并不算太悲惨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散的日子。

我很容易理解事物并且有异常好的记忆力，这就大大地助长了

我的懶散。對於本來就已傾向於懶惰的人說來，這兩者都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天賦。我做學生的時候一帆風順，因為我們要學的主要方面我一學就會，但是我在整個學習期間，從不懂得真正地、勤勤懇懇地讀書和在思想上力求上進。

當然我當時也缺少任何一種思想上的引導。我的兩位哥哥很早就離開家了，父親的職業與母親的家務勞動重擔阻礙他們從思想上督促我。由於居住擁擠，兄弟姊妹互相打擾，妨礙我在家里進行腦力勞動，此外我還要去做許多分散精力的事情。對於我這樣大的年紀（或者不如說這樣小的年紀）來說，去學校的路程是比較遠的，我常常為了找一個同學而走更遠的路，我還要為家里的事跑跑腿，做些別的事情。後來我同一位少年交了朋友，他的父親有一所射擊場，所需的材料是從一個為此而租用的花園里獲得的。於是，有好幾年的光景，我的一切空閒時間都為了幫他的忙而消磨在花園里或者射擊場上了。毫無疑問，長期在新鮮空氣中生活與活動對我的身體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智力發展方面卻受到了損失。我朋友的身體比我好，但他在思想上很敬佩我，耐心地聽我無窮盡地給他講許多故事。但是我至今仍然感到不可思議，我到底是從那里找到那么多材料的。因為我的父母親談不上有家庭藏書，我們沒有古典作品，甚至我的一些教科書也是相當糟糕的。由於經濟困難，這都是從舊書店里買來的一些破爛不堪的書，因此它們很少能有使人感到非讀不可的吸引力。我的同學不是住的離我太遠，便是生活在另外一種環境之中，這種環境使我不可能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發展比較親近的關係。在少年時期，我只有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出身的朋友。

在青年時期我雖然缺乏指導，然而也並不是沒有受過任何激勵而成長起來的。

精神激励和青年时期的政治印象

我的双亲都是犹太族的血统，并且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这种教派在德国同犹太教的关系，就像福音基督教中的新教徒联盟和天主教中的革新派一样。它的教徒们把星期日作为每周的休息日，并且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禁忌。他们的信仰是同十九世纪中叶开明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意向一致的。对于神的信奉者来说，宗教已经成为过分理性的东西，它却还不能使批判的理性感到满意。当我达到在成长中的少年开始热中于怀疑论观点的年龄时，批判的理性也在我思想里出现了。情感与怀疑一直在我心中交战。我还记得，我将近16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探望了一位同死亡挣扎的亲戚的病之后，在乘汽车回家的路上，由于内心激动而自言自语地作了祈祷：“敬爱的上帝呀！假若你存在的话，保佑我的堂妹吧。”

垂死者是我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的一位女儿。我父亲狂热地敬爱他的哥哥，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用敬畏的目光去看他。阿隆·伯恩施坦是当时拥有许多读者的《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和多年的社论执笔人，是博得亚历山大·冯·洪堡和其他的著名学者很高评价并且被译成多种语言的自然科学普及丛书的作者，他也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声誉。将近四十年来他过着名副其实的学者生活，1877年在图平根大学四百周年大庆的时候，被授与荣誉博士学位。他也是犹太新教的奠基人之一，写了若干赞美诗，并且在创教初期还作了几年传教士。在他发表的批判圣经的文章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关于阿伯拉罕、伊撒克和雅各传说的起源的论文，他认为这是由于宗教中心或者礼拜中心的形成与它们之间的竞争。

虽然我对他给我的一些鼓励很感激，但是他对我的思想发展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部分地要归咎于这一情况：由

于我們的住宅离他太远，我很少到他那里去，虽然我感到他的第一个妻子的最小的儿子特别吸引我。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有名望的人物面前十分拘謹。当我在少年时期到他那里去，或者当他来看我們的时候，我簡直是畏縮不前，避免引起他的注意，从来不敢向他提出一个真正的問題，而总只是远远地仰慕他。

学校也沒有給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課堂上的讲授有許多是我感兴趣的，但並沒有吸引我去进行独立思考。在我 11 岁的时候，一位对于教学十分严肃的老师，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向我提出了一个引起我思考的問題：我这个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怎么能指望死后升天呢？我說，假若我是一个誠实的人，行为一向正直并且作了許多善事……这时他反駁說：“是的，假若你想去羅馬的話，你是选择一条不方便的道路，穿过北极，越过半个地球，再穿过南极和越过南半球呢，还是选择一条直接的道路呢？”当时我沒有注意到，他这样說並沒有赋予基督教什么很高的倫理学上的价值。我沉默了，但是当我们分路以后，我思索了他所提的問題的意义，最后用如下的想法来安慰了自己：“假若耶穌·基督是像福音书上所說的那样善良的話，他也会原諒我不是基督教徒的，要知道我是犹太族双亲的儿子啊。”

从这种辯解方式中可以看出，我不很反对相信福音。我作为犹太人虽然在学校中不需要上宗教課，但是我經常去旁听。我必須說，新約全書及其人物比旧約全書中的人物更强烈地吸引了我，后者使我感到十分陌生。由于犹太新教的教堂离我們的住宅太远，我們簡直无法去参加一次礼拜，因此我星期天有时也到我們住宅附近的基督教的路迦教堂去。

我这种作法並沒有受到父母的責备。他們两人都沒有教会宗派的狹隘看法；我的母亲是出于强烈的宗教情感，我的父亲則对任何一种教派都是一視同仁的。他的这种态度使我放棄了在同那位老师談話后所作出的一个勇敢的決定。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犹太人，起碼應該做一个規規矩矩的犹太人，首先應該放棄吃猪肉的享受。想到就做到。我在一次吃飯的时候声明：“从現在起，我不再吃猪肉了。我們

都是犹太人，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禁止吃猪肉的，因此我也不再吃了。”而我父亲是怎样答复的呢？他若无其事地说：“好吧，你别吃猪肉啦。”这种宽容很快就粉碎了我打算为宗教而作的牺牲。因此，后来我就更加如饥如渴地去掌握自由主义思想，这是我当时从德国古典作家的作品选读中接触到的。

在这以前两年，我就被引导去进行政治思考了。有一天我母亲拂拭一些装上框子的画像上的灰尘，它们一直被放在閣楼上，这时准备拿来装饰我们房间的相当光秃的墙壁。它们是从1848年到1850年的民主战士的肖像，每张像下面都用本人的一句名言作为题词。我读了所有的题词，但只有一条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有一个看来很像犹太人的肖像下面写着：“国王们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听信真理。”下面的名字是約翰·雅科比^①。我问母亲，这个人是谁？她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偉大的人民之友。”

于是，康德的这位品德高尚的同乡唤起了我的兴趣，他一直吸引着我。尽管他的名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政治的了解仍然太差，不可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来。然而一年半以后，当由于普鲁士王位的更动，我们必须把国王颂歌“祝福你，戴桂冠的胜利者”中的这句歌词

“愿弗里德里希·威廉——
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
是人类的骄傲。”

改为：

“愿威廉国王——
永远是你的人民的荣誉，等等。”

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难道任何国王，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必须用‘人民的荣誉’和‘人类的骄傲’来加以歌颂吗？”我这样询问自己，并且产生了对世襲君主制相当有害的想法。

^① 約翰·雅科比 (Johann Jacoby 1805—1877)，激进民主主义者，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譯者注

1862年普魯士發生了軍事糾紛并且由此而引起了憲法糾紛，結果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對派，它甚至也影響了我們這些年青人。有一天在學校里，我們的老師——就本人來說這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在某些方面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上歷史課時，引用席勒的話來反對法國革命和警告我們不要去讀“政治性”的報刊。這時除了一個警察的兒子之外，我們全班都一致認為事實並非如此。人們用激進的語調講述1848年發生的事件，看起來一次新的革命肯定不久即將到來。

反對派情緒自然並不妨礙愛國主義潮流的高漲，它反而從後者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因為愛國主義首先是針對德國問題，即德意志的民族統一，在這個問題上人民是不願意信賴柏林政府的。不管符合事實與否，我們街道上的老朋友同我都認為有些德國的愛國歌曲，例如“守護萊茵河”和“德意志高於一切”在普魯士是被禁止的，因此大家傍晚就集合在地下室里偷偷地歌唱。我同兩位特別親近的朋友在外衣下面的胸前佩戴着象徵德意志的黑、紅、黃三色彩帶。

1863年底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嚴重起來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激昂地高唱“大海環抱着的霍爾斯坦”。我為戰爭結束後還鄉的將士們寫了一首模擬阿倫特^①風格的詩，朗誦給和我接近的同學們聽。我讓一位好友看這首詩，但他立刻把它給了級任老師，這使我害羞得落了淚。然而老師安慰我說：“你不必為這首詩害羞，從語言、結構和思想內容上講，你完全值得驕傲。”這一友好態度並沒有阻止我在不久以後感到他所作的一個決定很荒謬。這件事很能說明我當時的思想。他在上德文課時讓我們自由選擇我們需要背誦的詩篇，但是從其中刪去了一些，例如席勒的《托根堡騎士》。這學期開始時，他在我們的禁書單上又增添了卡爾·西姆洛克^②的敘事詩《愚人》。學

① 阿倫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 德國的愛國者和詩人，1813年抗法戰爭中著名領袖之一，寫有許多歌頌自由的詩歌。——譯者注

② 卡爾·西姆洛克(Karl Simrock 1802—1876) 德國詩人和日耳曼文學家，曾譯過著名的《尼伯龍根史詩》，著有《萊茵河童話》等作品。——譯者注

期結束的時候他給我們這樣解釋說：“在這首詩中丹麥人演的是高尚的角色，但是我們同丹麥人打過仗，因此你們不許背誦它。”儘管我有著強烈的愛國心，儘管我恰好特別尊重我的這位老師，我仍舊認為他這樣作是非常愚蠢的。個別事件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有什麼聯繫呢？

大致說來，1866年的普魯士對奧國和德意志同盟的戰爭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我認為這與其說是民族的事情，不如說是政府的事情。但是當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又是滿腔熱情了，這不是反對法蘭西人民，而是反對法國政府以及拿破侖第三。我讀到過他在1851年政變的事，因此我一直仇視他這個扼殺1848年共和國的兇手。“不許拿破侖取勝，假若我們打了兩次敗仗，我就去報名當志願兵。”我這樣寫給當時正住在鄉下的親戚家裡的知友威廉·巴丁。他的回答卻冷靜得使我吃驚。他說：“你不應過早地動火，難道我們確切地知道北部地區真正發生的事情嗎？因此，要保持心平氣和。”但是，我只是當拿破侖第三在色當被俘和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國以後才恢復到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平靜。按照我的看法，戰爭一定會從此結束了。既然事實並非如此，我對它以後的進展就完全失去了興趣。我根本不再閱讀戰場上來的報道了，因此在巴黎公社出現的那些日子裡很少知道它的消息。雖然如此，一年以後我就參加了一次紀念公社的會議。那時我已經是社會民主黨員了。

加入社會民主黨

1871年10月，布勞恩施魏克的軍事法庭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個派別的領導人進行審判，因為他們一年前，即在色當戰役之後，呼喚結束戰爭和反對為武力吞并亞爾薩斯—洛林所掀起的運動高潮。根據福格爾·馮·法肯施坦將軍的命令，他們被當作所謂的叛徒加上刑具押送到東普魯士的羅鎮監獄關了七個月。但是，在審前偵查時

已經証明對他們蓄意叛國的控訴是毫無根據的，於是他們就得為了妨害國家治安的莫須有罪名而替自己辯護。經過幾天的審訊，他們被判了相當長的徒刑。在他們上訴後，最高法院才把刑期大大減少，並且認為審前拘留已滿刑期，這事實上是釋放了他們。

柏林的所有日報中，僅有一家對這次審判發表了比較詳細的報道，這就是不久前激進的民主人士創辦的《民主報》。巴丁和我以及幾個朋友共同訂閱這份報紙，這主要是因為領銜署名為它宣傳的是我們非常尊敬的約翰·雅科比。巴丁是麥爾克農業區一個小農的兒子，由於和我思想很一致而成了我的好朋友，直至他幾年前去世為止。我們非常關切地注視這次審判的細節，它使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黨完全不是柏林報刊所描繪的以及在柏林占優勢的拉薩爾派支部的行為所表現的那個樣子。從此我們就更多地關心運動了。1872年初，我們在一家酒館里認識了社會民主黨人弗·威·弗里切（曾任國會議員直到1871年）之後，就邀請他到我們的交誼會（這是我們同另一些人一齊創辦的，按照托馬斯·莫爾的政治小說命名為烏托邦。但是關於莫爾，我們只知道他描述了一個天堂式的公社）來作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他照辦了。

為了對社會主義有所了解，我已經買了拉薩爾的論爭性著作《巴斯提亞得·舒爾采·馮·德里奇先生》和杜林著的《國民經濟學與社會主義批判史》。但是我在後一著作中看到的社會主義並不能使我对它產生熱烈的興趣，而拉薩爾的論爭性著作，由於用語過分激烈，不如說使我感到厭惡。這時我們從弗里切那里更詳細地了解到使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成兩個鬥爭很激烈的派別——拉薩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愛森納赫綱領派的社會民主工黨——的爭論，關於後者最杰出的領袖倍倍爾與威廉·李卜克內西以及他們這一派同國際工人聯合會（它的原則和政策特別吸引我傾向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是曾經多次讀到了的。

此外還有什麼是使我這個雖然不算資產階級，但畢竟也不屬於無產階級的人對當時那樣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產生熱情的呢？拉薩

尔的由国家貸款給生产合作社的理論与其說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目的，不如說是一种鼓动手段，《爱森納赫綱領》則除了包含从国际的章程中引用来的条文以及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以外，仅仅还有对国家促进合作制度的很不确切的要求，人們可以对此作十分美妙的遐想，可是毕竟不能受到激励。但是，国际主义！

在战争期間，虽然我全心全意向着德国的事业，但是恐惧重新侵襲了我，我怕的是，每次战争以及由于战争而确定下来的民族意識会伤害人們的情感。正因如此，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这些人在战时和战后所持的态度更加使我感到敬佩了。

不久以后我便亲自認識了倍倍尔。1872年3月，他同李卜克内西和阿道夫·赫普納（后者是李卜克内西主編的爱森納赫派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編輯）被控蓄謀叛国，在萊比錫受民事陪审法庭的审問。尽管連謀叛的痕迹都无法指出，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还是被判处两年徒刑。倍倍尔在入獄之前，作为社会民主党在1871年3月大选失败后国会中的唯一代表来柏林参加国会的一次會議，他借这个机会到一个由爱森納赫派社会民主党人組成的民主工人协会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說。这已是足够的理由使巴丁、我和其他两位思想投合的朋友弄到了入場券，到柏林北区殘存的城墙旁边的一家酒館里参加庆祝会。

使我們吃惊的是，这間可以容納四百人左右的大厅仅仅坐滿了一半。何况倍倍尔的确已經是一位知名的政治家了，几乎所有的柏林报纸都登載了持續整整两周之久的叛国案审判的报道。左傾激进分子的报纸也經常怀着一定的敬意来談論倍倍尔这位人所周知的辛苦謀生的忠厚旋工。然而，他的名字竟沒有較大的吸引力，的确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对我们來說，却因而有了进一层的理由加入这个以它的两位最重要的領袖为代表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党。

因为我的伯父当时正在《人民报》上猛烈地攻击社会民主党，我的入党几乎被认为是一桩大事，对于倍倍尔說来，我就像是一个奇人。他在庆祝会上的讲话虽然朴实无华，但也并非沒有热情。在庆

祝会结束之后，一位年青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着我的面私自向倍倍尔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他的意见，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所希望的革命呢？这时隐藏在他内心里的乐观主义显露出来了，他回答道：“哦，我认为最迟约需20年。”

銀行職員和鼓動員

那时我在一家銀行里工作。我最初进的是一所七年制的私立学校，毕业之后，就我的年岁说来我的身材还嫌太小，并且体质很弱，因此没有让我立即就业。我被送进一所九年制完全中学，学费是一位同我母亲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富有商人资助的。一般说来，我在母亲的方面有几位很富有的亲戚，但这是三代或四代上的远亲，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

由于入学考试时作了一件蠢事，我没有能插入第四年級（虽然那一年級的大部分课程我都熟悉），还要从二年級讀起。这就使我在思想上完全放纵自己。我比較差的功课只是当时文科中学（我进的是柏林弗里德里希·維德尔中学）不重視的那几門。我最好的功课是語文与数学，这两門是没人赶得上的。在私立学校中学过的那几門课程，现在在四年級甚至在五年級都几乎没什么可学的了，这一点对我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到了六年級，就暴露出我的知識有严重的缺陷，我对我的上帝般的智慧（請原諒我这样說）发生了怀疑，这使我大为震惊，因而我竟向父亲让步，同意不繼續求学而去从事商人职业。由于一位舅父的努力，我被古滕塔克兄弟銀行收为学徒。在四年的学徒期間我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开始做学徒是在1866年的晚秋，由于美国内战与普奥战争的影响，柏林的銀行界正盛极一时。美国与奥国的货币利率高而行情低，做这两种货币的交易和投机是一桩有暴利可图的买卖。那时訂下了几笔定期的、性质十分复杂的

生意，要想作好非要具有一定的数学才能不可。我的上司对此有着独特的天赋，我也乐于致力于此。尤其重要的是，后来我的上司改做同維也納与巴黎的汇兌业务，因而我有机会进入銀行业务中公认为最重要的一門里工作。此外我还学到了用不同国家货币記联合賬目的方法。这本来不需多大能耐，但是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本領呢。

也許应当在这里說一下，决定我后来精神活动偏向的那一思想素质。

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綜合性的思維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現在还記得的在中学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可以說明这一点。有一天数学教师給我們讲解了一种計算方法，然后讓我們用它来解答一个問題。結果能交上正确答案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当老师为此贊揚我的时候，我却害羞地拒絕說：“先生，我并没有按照您的方法来解答这个問題。”他回答說：“没关系，应该去找窍门。”但是，我找到的是什么样的窍门呢？我把題目分成若干部分，毫不費力地解答了每一部分，然后也同样容易地获得了总的答案。这不失为有效的办法，但是在这一場合，掌握前面讲的方法要比找出答案重要得多，我同其他同学一样都沒有做到这一点。这表明，在綜合思維方面我并不比他們强。

下国际象棋也是一样，我曾經有一个短时期十分貪玩它。一般說来，我的開場几着是很蹩脚的，总是在我比对手多丟掉了一名将官并且因而必須为了有限的目的而集中精力的时候，我的棋才开始下得比較順利。

学徒期滿之后，我的上司把我介紹到魏瑪的一家銀行剛剛在柏林設立的分行作書記。我在那里沒有呆多久，1871年夏天轉到了S. & L 路特希尔德銀行担任同样的职务。它是一家从威斯特发里亚迁来的企业，在位于萊茵河畔的科倫城还有分行。我在这家銀行里工作了七年之久，在那里經歷了从1871年至1873和1874年間的所謂建設年代，經歷了結束这些年代的交易所倒閉風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商业生活的长年停滯。我对于同这些建設难解难分的交易所舞弊

的亲身体会，大大促进了我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准备。可以理解，我当时还只是从纯粹道德方面来判断这些事的。我同大家一起认为与建设相联系的谋取暴利的勾当——主要是把工业企业转为股份公司——是事件的主要内容。最初的一些建设确实是由于货币充斥市场、由于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巨大繁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扩大企业及其经营资本的必要性所引起的，所有这些建设的表面上的好运像号声似地引诱人们去模仿它们。这样一来，自然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资金过多的现象，把股票价格抬高到不应有的地步。那时的柏林报纸或者他们的商业栏编辑们则长时期地发表一些粉饰太平的文章来昧着良心给这种不法行为火上加油。他们被公司发起人通过贿赂收买了。这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当的，并且是以后的合股法所禁止的。贿赂的形式是：或是报社的社长，或是商业栏编辑名义上认购一定的股份而参加公司发起人集团，并且在股票在交易所上市的时候将分到其名下的股票按照——人为抬高的——上市行情“出卖”。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入股金额和卖出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利润”。了解到这些勾当的细节的我，因而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已彻头彻尾地腐朽了，我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因此更加巩固了。^①

作为社会民主党党员，我较快地能够出面作鼓动工作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后来被尊为党的最英明的代表之一的伊格纳茨·奥艾尔所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成功地做到了给柏林爱森纳赫党人所进行的十分教条的宣传带来生气。奥艾尔当时还是一位普通的制鞍工人，但是正届精力旺盛之年，就是他把当作鼓动家而“发掘”（可以这样说）出来的。我担心自己也会像和我同年的一位也是商人出身的同志一样，每讲完一句话就要重新修饰一次，以致把一

^① 在德意志帝国初期，自由主义的报刊控制着舆论，因此被选中的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的报纸。然而保守派的报纸也并不蔑视“交易所犹太老板”的殷勤。我还经历过如下的事情：当我的上司在交易所发行一种实业证券时，一家极端保守派的周刊的老板长时间等着他接见，这是为了即使分不到股份的话，起码也要搞到一个整版的广告。为了达到另一些与交易所有关的目的，经常有普鲁士高级贵族在我的上司那里出入。——作者注